

近代 天津

名人丛书

天津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出自天津。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部丛书，记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近代天津 十二大教育家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黄炎智
编委 田桂林 杨大丰 李树人
方尧麟

主 编 田桂林
副主编 李国丽

总 序

黄炎智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转瞬间本世纪行将结束，新纪元即将到来。在世纪之交，回首天津百年之历史，真可谓沧桑历尽，覆地翻天。自明朝设置天津卫以来，至本世纪末，天津尚不足 600 年历史；但自上世纪末至今的百余年间，天津却饱经风霜，从外辱内患到阅尽人间春色，特别是上世纪末叶至本世纪中期，天津作为京畿门户、海防重地、北方经济中心，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很多著名历史人物都在天津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曾几何时，各路豪杰在此舞旗弄潮，各方志士在此砥砺前行图强。于是，军事救国者有，实业救国者有，教育救国者有，科学救国者有……芸芸众生，不一而足。然而大潮之中，不免泥沙俱下，除仁人志士风云际会于津门外，也有来此淘金的、冒险的、寓居的、醉生梦死的。正是这种珍珠与鱼目的共存，构成了五彩斑斓的近代天津，天津也因此而名传天下。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天津的发展更是如此。纵观百年，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活跃在天津这个舞台上，从不同侧面或者推动、或者阻碍天津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果把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将其真

实地再现,人们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而且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过去,了解天津。有鉴于此,1996年下半年,首先由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汤洪、方兆麟等同志提出来编辑一套“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设想,我对他们的设想十分赞赏,随即提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讨论,经过谢天培、南炳文、孙维甫、乔维熊、杨大辛、田桂林诸同志的充分研究,认为这件事不仅可行,而且十分有意义,对于宣传天津、进一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很有必要。同时一致推举我任该丛书的总主编。我当时作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于是这个设想被正式定下来,列入工作计划。为了使这个计划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由我主持又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具体研究编辑方案。参加第一次座谈的同志有张澜生、徐景星、罗澍伟、乔维熊、杨大辛等同志,大家兴趣很高,七嘴八舌一下子提出了近20个选题。经过议论,进一步明确了编书的宗旨、编辑体例,确定了首批编辑书目。同时也确定了担任这套丛书各分册主编的原则。大家认为各分册主编应尽量由熟悉选题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担任。

然而编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不仅要组织人力,还要下很大力量去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出版这套丛书要有经费,有了“经济基础”这项工作才能有保证。为此,我让文史办公室尽快起草个申请专项经费的报告,并将报告立即转报给市政协主席刘晋峰,晋峰主席很快将此件转市政府张立昌市长。立昌市长非常重视此事,很快批下了经费,从而使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了保证。经过各方面近两年的努力,现在终于看到这套书要陆续出版了,怎能不令人欣喜!可以说,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各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

首批确定的6个选题,即近代天津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收藏家、寓公、买办和京剧票友,在编写过程中既考虑到了其史料价值,同时又注意到了内容的可读性。每本书收录10人左右,都是经过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充分研究后筛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各书的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物做了翔实、生动的记述,从而使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周学熙是如何兴办北洋实业的?范旭东是如何创制出“红三角”牌纯碱的?宋紫卿是怎样纺出“抵羊”牌毛线,并使之行销全国的?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是怎样兴办南开教育的?民国初年林墨青是如何兴办社会教育的?收藏家张叔诚是如何得到无价之宝“窑变观音”、最后又怎样被毁掉的?夏山楼主韩慎先除了是“名票”外,他在鉴定与收藏文物方面有哪些“绝活”?北洋时期的总统、总理及一些大军阀下台后来天津干了些什么?清末宫廷大太监“小德张”出官后在天津怎样度过了他的晚年?天津京剧名票“三王”对京剧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是哪些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等等、等等。我相信通过书上那生动、翔实的描写,不仅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个个丰满、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且还可以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佚闻和趣事,而这些恰恰是在一般历史书籍中难以看到的。这些历史人物虽然生活在天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局限于天津,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侧面,因此这套书对于学习中国近代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天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还将不断地充实这套系列丛书的内容,陆续向读者推出新的书目,如天津著名的商人、著名的银行家、著名的报人、著名的曲艺家、影剧名流、社会名流等等。总之,我

们将通过这套书使读者更加了解天津、认识天津,也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点有用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同志参加到编著这套丛书的工作中来,为发展天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套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是作者们的辛勤努力。各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士,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收集资料,由于他们的努力为成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再者,是各书的主编们,他们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各自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他们在工作的百忙之余,积极策划,审定稿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粗取精,去虚存实,才使这些书能顺利付梓。还有这些书的责编与出版者,也都花费了不少精力,一遍遍的审校,使这些书能最后出版发行。在这里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特别是在历史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和谅解。

谨将此丛书作为世纪之交的献礼,愿人们接受它!

序

田桂林

奉献给读者的《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这本书，是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辑的“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中的一卷。

天津，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缩影；天津近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天津近代教育始于洋务运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在洋务运动中，为适应新的生产力的需要而兴办了一批洋学堂，是在天津最先诞生的新式学校，这在当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在其影响下，天津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北洋大学就诞生在天津，标志着天津近代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北洋大学培养出众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末实行“新政”，延续了1300年的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天津废庙兴学，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并走上了较为正规的道路。这期间，天津的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民国前期，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方法在天津进一步传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也传入天津，并经初步实践，使天津近

代教育开始走向现代教育的新阶段。在天津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长和涌现出了一大批对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在策划编辑“近代天津名人丛书”时,觉得非常有必要编辑一本近代天津教育家的书,这是编者的共识。编辑出版这本书,旨在宣传学习为发展天津近代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总结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利天津当前和今后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把天津的教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为了编好这本书,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于1996年6月28日邀请天津教育界、文史界的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有钱忠源、高平叔、罗澍伟、王家琦、王惠来、谢天培、杨大辛、徐景星、许杏林、张绍祖等。会议提出,关于入选“近代天津教育家”一书的教育家的标准须基本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对推进天津近代乃至现代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着重看其在天津的业绩,即他们的事业是在天津发展起来的,对天津教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为社会所公认的代表人物。二是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兴教办学中提出了一定的教育主张,有理论,有实践经验,对全国的教育产生一定影响的爱国的知名人士。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业已成名,现已故去的人(为本书的上下限)。依据这个标准,并经反复研究、多方听取意见,最终确定了入选本书的12位教育家。这就是: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千里、兴办新式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林墨青、官绅办学的代表人物卢木斋、为国捐躯的赵天麟、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刘宝

慈、毕生从事师范教育的齐国梁、从事商业教育 50 年的徐克达、一生从事工业教育的魏元光、主持清华校政 30 年的梅贻琦、创办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宝泉。这 12 位教育家是从天津近代各级各类教育家中遴选出来的，是教育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许多教育家，如胡家祺、温世林、李金藻、傅增湘、李叔同、邓庆澜、陈星彩、张彭春、夏景如、张元弟、茅以升、刘乃仁、杨石先等，他们对天津教育事业历史性的贡献是载入史册的。他们的业绩永久地被后人缅怀，他们的爱国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后来人继往开来、勇往直前。鉴往知来，天津的教育事业曾有过走在全国前列的光荣历史；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天津教育的辉煌灿烂。

本书的作者对所写的人物，大都素有研究，比较熟悉，又广泛搜集资料，精心编撰，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所写人物采用传略写法，以其从事教育为主线，展其生平事迹，详略得当，语言流畅，可欣然卒读矣。笔者忝列主编，对教育又无专门研究，担此重任，实为勉为其难，虽竭力想编好此书，但不妥之处恐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教。

目 录

总序	黄炎智(1)
序	田桂林(5)
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	梁吉生(1)
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	梁吉生(23)
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千里	廖永武(55)
兴办新式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林墨青	许杏林(92)
官绅办学的代表人物卢木斋	曲振明(108)
为国捐躯的赵天麟	李国丽(132)

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刘宝慈

田桂林 李国丽(150)

毕生从事师范教育的齐国梁 齐文颖(170)

从事商业教育 50 年的徐克达 张绍祖(197)

一生从事工业教育的魏元光 王家琦(208)

主持清华校政 30 年的梅贻琦

邵宝仁 柴寿安(250)

创办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宝泉 朱经畲(279)

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

梁吉生

严范孙是天津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是革新封建教育，积极倡办私立学校，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先行者。严氏家馆、严氏女塾、严氏女学、保姆讲习所、私立第一中学都是在他的家宅办的私立学校。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的成立和发展，都与他的捐助和支持，他的道德精神感召力密不可分。



严范孙

严范孙主张学习先进教育思想，极力支持社会教育，为天津近代社会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供 职 京 华

严范孙，名修，号梦扶；别号缙屨生，幼名玉珪。他的书室名恒斋、蟬香馆、毋自欺室。先世浙江慈溪人。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经商北来，定居天津。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入侵，全

家避居直隶(今河北省)三河县。1860年4月2日严范孙就出生在这里。

严范孙青箱传世,饱读经书。6岁时从塾师学习,开蒙课本是《龙文鞭影》。7岁习字,8岁作试律。12岁开始参加八股考试,18岁应院试,补禀膳生。这年认识了博通西学的陈奉周,从其学习天文、数学,“深获讲贯之益”。23岁应顺天乡试,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击节赞赏,中举人。回津后受到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接见。次年赴京应会试,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按清朝规定,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3年,经考试优良者可授编修等职。严范孙在科举道路上奋力拼搏,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达到封建统治的上层。1886年被授翰林院编修,8月正式入京供职。是年冬,补国史馆协修。1889年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任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1894年授贵州学政,离京赴贵州。8年宦海生涯,严修正是而立之年,他有着强烈的抱负,但也耳闻目睹了官场的腐败情况。特别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使年轻的严范孙忧怀祖国,“心伤岛国沧桑古”,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期间,他不仅博览中国文化典籍,如《尔雅》、《说文》、《易》、《诗》、《荀子》、《列子》、《史记》、《通鉴》等,而且孜孜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自1880年起,他开始研习天文、算学,披读《数学理》、《数理精蕴》、《天文启蒙》等书。在京时寓五老胡同,每在晚上与人探究自然科学书籍,开阔了眼界,对新学有了初步的体会。

督 学 黔 中

严范孙在京师8年被任命为贵州学政,于1894年10月离

京,踏上黔蜀 5000 里的征途。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一路上清军失利的消息犹如鸭噪马头追逐着他,使他震惊,“嗒然若丧”。到达贵州后,亲眼看到边省贫穷、士习闭塞的情状,使他深感国家必须变革。

他到任后,立即赴黔省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当地文化教育情况。严范孙是一位比较开明、有责任感的封建官吏。针对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等“方今士习之蔽”,颁发劝学告示,提出“敦品励学,讲求实用”,并以此作为选科取士的标准。考试时一改旧规,考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考算学。优贡、拔贡的考选,不但进行笔答,他还亲自面试,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品德。同时,大胆变通书院旧法,仿照经世学堂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青年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学外,增设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和英文,使之成为晚清贵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正如黄炎培著《清季各省兴学史》所说:“贵州学政严修将南书院改办经世学堂于贵阳,聘贵州名儒雷廷珍为堂长,调各县优秀生员四十人肄业。讲授以经史、算学为主,同时还教授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据雷廷珍《哲学碑缘起》载:“严太史范孙督学黔中,即创议开设书局,变通书院,兼业中西,延余主讲中学,而西学则自任其难,孤诣苦心,虽不能为外人道,而亲炙者如饮醇醪矣。”

严范孙在学政任上,亲身感受到封建科举的严重弊端。尤其《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就是一句空话。他说:“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无一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称赞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称其《公车上书》“忠肝义胆,一掬而出,五洲利弊,

了了纸上”。1897年9月，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直称“康长恕（素）之疏，真卓识也”。10月19日，他酝酿多日的《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上奏，要求清廷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特科的先例，破常格以搜才，设新科以劝士。经济特科的主要内容是，对“周知天下郡国利病”者，“熟谙中外交涉”者，“堪游历之选”者，“工测绘之长”者，统统量材取用，同于科举正途出身，并且选拔不限数额，通过举荐和考试，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资格出身皆可录用，赴试者经济上有困难的还可给予公费补助。同时规定，“责成内外诸臣搜访保送，蔽贤者惩处，荐贤者上赏”。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开皇7年（587年）科举取士以来的一大突破。它打破了唯一通过科举取士的渠道，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网开一面。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举，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是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

严范孙在黔3年，兴教育才，清正廉洁。他在任上非但未因官致富，反因替当地购买图书、捐助俸薪而负债4000两白银。严范孙离开贵州时，学生弟子依依不舍，贵州学界为他立“去思碑”和“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津门兴办教育

严范孙任贵州学政期满，1898年4月回到北京，但因倡设经济特科为封建顽固派所不悦，也以此失欢于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翰林院职务被免去，仅留编修虚衔。严范孙长才难展，于是便以“请假”为名回到天津。

严范孙回到天津后以其家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的传播。11月，聘请年轻的退役海军士官张伯苓作家馆教师。后来张伯苓还兼任天津著名商业家王益孙家馆教师。这种家馆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塾学，而是更多的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

1900年八国联军血染天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严范孙毅然站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同时尽其所能倡办地方教育。为了“教育救国”，1902年、190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系统地观摩日本的教学和学校管理。日本教育变革的勃勃生机，深深打动着这位教育革新家的心。他说：“吾国所以弱，学之不讲之故也。彼日本区区三岛，独能称雄东亚者，学而已。”

1902年8月到日本后，参观了一系列社会公共设施和政府机构。仅大、中、小学就参观了20多所，并广泛地接触学校教师和教育官员。9月1日，他与日本教育界人士座谈，征求对中国教育的看法。日人认为，中国讲求新学多于表面，应以“正人心”为主。“正人心”须从课堂教育入手，教师所讲的要让学生亲自去实践。世人只知日本维新的好处，而不知这是基于德川氏百年以来尊崇知识之功。日人的谈话使严范孙思想为之振奋。不久，还有一件事对他刺激很大：9月14日，他赴浅草寺参观，那里到处置有我国台澎山水风景及中日战争的图画，而且战争画多是“彼国人得意之举”。陪同参观的人介绍，日本教育儿童，首先要告诉他们中日甲午之战，日本为什么能胜，清朝为什么失败，使儿童从小“人人脑筋皆刻入此事”。观兹听兹，严范孙异常悲愤，不禁慨叹：“伤哉，吾国之人其伤以为心乎！”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

力，兴办新式教育。这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严范孙一向重视对女子的教育，经常让她们学习浅近的诗词文章，体察做人特别是女子的修身根本。为此，他手编《教女歌》：“女儿家，要柔顺，跟着娘，听教训。嫂子前，有礼行，多体情，少任性。姐妹们，须和美，莫呕气，莫斗嘴。”“女儿家，要早起，一起来，就梳洗。父母前，问早安，他二人，也喜欢。有等人，太酸懒，早饭时，才睁眼，拿点心，当作饭，见了饭，不能咽。你看那，对不对，出了阁，也受罪。”严氏女塾是在一般家教基础上设立的新式的学校教育。课程内容全部是新学，计有国文、算术、英文、日文、音乐、手工、织布等。聘日本人教日语、音乐、手工、织布。严亲自教作文，批改作业。学生是严氏及亲戚、朋友、邻居的女儿，年龄在10岁到20多岁。据女塾学生穆祥淑女士回忆，当时天津比较守旧，不愿意送女孩上学，有的人是经过严家动员才得到父母允许就读女塾的。严氏女塾的创办，在天津是开风气之先，对妇女走入社会独立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津《大公报》称其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正规的女子小学，学制初小4年，高小3年。

1905年，严在家中还办有保姆讲习所与蒙养园。保姆讲习所是培养幼师师资的师范学校，聘日籍女教师大野铃子主持。课程有保育法、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还有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由南开中学教师兼任。首批学生20多人毕业，其中有刘清扬、韩咏华、韩非华等。毕业生大多到津、京、冀等地蒙养园（幼儿园）工作，成为我国最早一批幼儿教育的骨干。

随同保姆讲习所设立，严氏蒙养园也相继创办。招收4—6岁儿童入园，授以唱歌、游戏、手工、讲故事等课程。中国蒙养教